

LSKX

歷史科學

新论点便览



● 杨祖希 主编

●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蔡 枫

封面设计：蒋洪源

历史科学新论点便览

杨祖常 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50×1168 1/32 印张：9.6 字数：230,0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2-00904-5/K·147 定价：3.90 元

D407/11

出版说明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学术界勇于并勤于探索真理的学风大盛，提倡多年的“双百”方针真正得到了贯彻执行，其间虽然有资产阶级自由化风的干扰，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批判地继承国内的学术遗产和借鉴国外的学术思潮，始终是我国学术研究发展的主流，广大研究工作者所提出的符合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新论点、新学说、新见解，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宝贵的财富，值得保存、参考和交流。但这些新论点散见于各种报刊和图书，查考不便。为便于检索和使用，我社特组织力量，采用执简御繁的工具书形式，先就历史科学编成新论点便览一册，将来如有需要又有可能，可以再组织力量，就其他学科陆续分编便览，以期形成系列。

本书在工具书中属于手册类型。选编对象以1979—1989年我国学者所提出的新论点为限。在选编过程中，我们注意贯彻1989年6月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对十年期间在历史科学领域内广泛提出的论点进行了筛选，凡属于下列情况者，概所不录：

一、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原理，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所谓“新论”。

二、以“反传统”为名，故作新奇，实则旨在哗众取宠的翻案

三、虽改头换面，但实质不变的旧说。



951916

四、并非出自自己研究所得，而只是鹦鹉学舌地照搬国外学说的所谓“创见”。

五、不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所谓“独到见解”。

本书所收问题，分为史学理论、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四部分，按类编排，连续编号。各类之中，再以问题大小、时间先后、地域区划等为序。介绍方法，完全以工具书所要求的客观性为原则，尽可能引述提出者的原话，原话过长时则作有删节的间接摘引，但仍力求保留原作的用语和笔调。所有论点，均注明提出者姓名和资料出处，而不采用“一种意见认为，另一种意见认为”等格式，以期存真，并避免掺入选编者个人的主观意见。需要介绍传统观点才能显示见解新颖的，在有关问题的开头扼要概括叙述。对于所摘论点的提出者和有关著作物，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谢意。

本书由杨祖希主编，编纂者为荣颂安、庄辉明、李学昌、余伟民、任余白。由于资料和水平的限制，遗漏和失误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0年3月



目 录

史 学 理 论

新时期历史研究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3) 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新见解 (5) 五种社会形态说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8) 原始社会分期问题的新探索 (9)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研究新观点 (11)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新进展 (12) 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新探讨 (13) 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新论点 (15) 历史发展动力的新观点 (18) 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 (22) 暂时性、延续性和变异性是人类社会固有的历史性质 (24) 各民族共同努力, 缔造和发展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 (25) 对民族英雄的新认识 (26) 应该肯定改良的历史作用 (26) 地理环境对历史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28) 要重视历史发展中的偶然性因素 (29) 要充分肯定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30) 人民群众不是历史的唯一创造者 (32) 从历史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 是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 (34)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特征的再探讨 (36) 史学理论的对象、内容和范围的新观点 (39) 对历史研究对象的新认识 (42) 史学研究必须为现实服务 (43) 史学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关系 (44) “借鉴”说是否应当放弃的争议 (46) 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可表述为“参预现实, 超越现实” (46) 对史学的社会功能的新看法 (47) 历史学可否区分为基础史学和应用史学 (49) 传统史学思维模式亟待变革 (51) 要建立科学的历史认识论 (52) 在历史认识特征问题上的分歧 (53) 加强历史研究中的主体意识 (54) 史学方法论应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 (57) 当前史学研究应着重高扬历史认识的新实践性 (58) 史论关系的新提法 (59) 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的新

认识 (60) 没有宏观历史研究,就没有现代历史科学 (61) 阶级分析不是唯一的历史研究方法 (62) 历史的逆向考察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方法 (63) 中介研究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63) 假设是历史研究中重要的科学方法 (64) 对历史要进行多层次研究 (65) 历史研究可以引入自然科学方法 (66) 历史研究应广泛运用系统方法 (67) 数学方法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工具和手段 (69) 模糊方法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补充手段 (71) 史学评论是促进史学发展的动力 (71) 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72) 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问题 (74) 对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及其特点的新论点 (75) 中国古代史学长期迟滞的五大原因 (77) 史学的危机与出路 (78)

中 国 史

中国奴隶制经济制度具有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特征 (85) 封建地主的产生主要依靠暴力和政治手段 (86) 中国古代社会是渐进发展中的贵族宗法式的农业社会 (87) 方形城是中国古代城形制的基本模式 (89) 中国古代文化存在着地区差异 (90) “重农抑商”政策的新评价 (91) 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特点新探 (93) 中西文官制度比较新说 (94) 明清思潮与文艺复兴的比较 (94) 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 (96) 买办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起过积极作用 (97) 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阶段说 (98) 西学东渐三阶段说 (99) “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新议 (100) 中、法启蒙运动的比较 (102) 爱国主义是晚清思想史的主线 (103) 中国民主党派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特点 (104) 五卅运动是旧民主革命到新民主革命转变基本完成的标志 (106) 中国现代史应从1949年开始 (106) “炎黄”应为“黄炎” (108) 商代官制具有原始性的特点 (109) 周代不存在君主专制制度 (110) 周平王东迁非避戎 (111) 先秦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人性学说与君主专制主义理论 (112) “焚书坑儒”应彻底否定 (113) 秦始皇开启丁儒学独尊的大门 (114) 秦亡原因新探 (115) 秦汉是中日两国关系的奠基时期 (116) 火药发明于汉代 (118) 指南针是汉代发明的 (118) 造纸术是否东汉蔡伦发明的? (120) 夷陵之战决定三国分立局面 (121) 诸葛亮北伐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论争 (122) 孙权历史地位新说 (123) 赤壁之战新论

(124) “玄武门之变”起因新探 (125) 科举制起源于唐代 (126)
北宋的重文轻武政策有积极作用 (127) 王安石变法失败原因新说 (128)
司马光不是守旧派与顽固派 (129) 朱元璋杀戮功臣原因新探 (131)
“郑和下西洋”动因新说 (131) 明清江南市镇结构与特点 (133)
清代人口激增的主因不是丁税制改革 (134) 不能笼统地说清代前期实行
了一条闭关锁国政策 (135) 清代许乃济弛禁策评价新探 (136) 李自
成大顺政权失败原因新探 (138) 鸦片战争应该是三次 (139) 太平天
国定都天京新探 (140) 天京事变中的洪杨是非新论 (141) 《资政新
篇》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方案 (142) 《资政新篇》的文化学思考 (143)
实行过激政策是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 (144) 历史上并不存在“洋
务派”和“洋务运动” (145) “师夷制夷”、“中体西用”是洋务运
动的指导思想 (146) 洋务派创办中国近代海军的动机不应全盘否定 (147)
曾国藩办洋务应该肯定 (148) 中日甲午战争是否宣告了洋务运动“彻
底破产”? (149) 北洋海军不应全面否定 (151) 策略错误是戊戌变法
失败的主要原因 (151) 对光绪政治身份的不同看法 (153) 戊戌维新
与辛亥革命异同新说 (154) 康梁歧异新说 (155) 义和团运动不具有
反封建性 (157) 东南互保新探 (158) 孙中山学说与传统儒学的渊源
与区别 (159) 中部同盟会的成立不是一种分裂行为 (160) 五四时期
的张东荪、梁启超不是地主买办阶级代表 (162) 对陈独秀的新评价
(163) 改组后的国民党是不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质的革命联盟? (165)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166)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169) 武汉政府继续北伐是战略错误 (170) 关于武汉国民政府性
质的研究冲破禁区 (171) 对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运动的新评价 (173)
对国民政府“关税自主”的新评价 (174) 重新审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
战 (175) 不是五次反“围剿”而是六次反“围剿” (176) 重评国民
政府法币改革政策 (177) 张学良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首倡者 (179)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 (18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是中
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决定的 (182) 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是其政策转向抗
日的起点 (183) 国民政府转向抗日的基本原因新探 (184) 国民党在
抗战初期的军事战略方针新探 (185) 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战场的 新评价
(186) 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 (189) 抗日战争时期不能用“官僚资

本”代替国家资本 (190) 对抗战时期蒋介石的新评价 (192) 抗日战争不存在战略反攻阶段 (193) 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194)

世界史

古代世界三大文明地区 (199) 古代城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199) 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及其影响 (201) “世界中世纪”概念不能成立 (201) 西欧封建社会解体原因新探 (202) 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具有独特的上层建筑因素 (203) 阿拉伯文化传播西欧途径辨正 (204) 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保守性与彻底性再议 (205) “普鲁士式道路”再评价 (207) 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被革命所制止 (208) 世界现代史的开端应早于十月革命 (209) 共产国际新评价 (210) 民族资产阶级在现代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应当肯定 (211) “远东慕尼黑”新探 (212)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弊大于利 (214) 苏芬战争并非正义战争 (215) 两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联系与区别 (216)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和性质 (217)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线作战的经验与教训 (218) “奇怪战争”是一种特殊的战争现象 (219) “第二战场”推迟开辟的原因 (220) 《雅尔塔协定》和美苏远东战略 (221) 世界当代史学特点刍议 (223) 邪马台国考 (224) 大化改新性质新探 (225) 明治维新再探讨 (226) 军部政治化是日本法西斯化的前提 (228) 日本投降的直接因素新探 (229) 日本不是无条件投降 (230) 甘地新评价 (231) 印巴分治的社会宗教原因 (232) 苏格拉底之死与雅典民主政治 (233) 机会主义路线是导致1945年希共投降的根本原因 (234) 英国新贵族身份辨 (234) 克伦威尔新评价 (236) 本世纪英国的军备政策与绥靖外交 (236) “自由、平等、博爱”口号提出时间的修正 (237) 丹东新评价 (238) 小资产阶级专政是雅各宾专政失败的根本原因 (239) 热月政变的性质 (239) 拿破仑和拿破仑战争新评价 (240) 巴黎“公社墙”考辨 (242) 马丁·路德新评价 (242) 俾斯麦及德国统一道路新评价 (243) 卢森堡新评价 (244) 德国法西斯专政不仅是金融资本的代表 (245) 希特勒开战决策初探 (246) 哥伦布新评价 (247)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247) 俄国二月革命的自发性 (249) 俄国十月革命

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249) 耐普曼阶级属性及其作用新议 (250) 列宁“遗嘱”考辨 (251) 托洛茨基新评价 (252) 布哈林新评价 (253) 基洛夫被刺事件新解 (256) 苏联30年代的肃反运动应彻底否定 (256) 战略理论落后是导致苏德战争初期苏军失利的主要原因 (257) 赫鲁晓夫改革新评价 (258) 玛雅文明的起源新说 (260) 玻利瓦尔新评价 (260) 林肯新评价 (261) 美国“新形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规律和特点 (262)

考古学

中国的考古学要进行整体研究 (267) 我国考古学须从器物的研究转向人的研究 (267) 中国田野考古学产生前的考古学应定名为金石考古学 (268) 我国考古学研究存在五大潜伏的危机 (269) 禄丰古猿的进化系统地位 (269) 从猿到人过渡阶段是相对独立的阶段 (271) 木器时代是人类社会史的第一章 (272) 北京人生活时期的周口店一带属温带气候 (273) 中国是太平洋区域最古老人类和文明的发源地 (273) 北京猿人是美洲印第安人祖先 (274) 对第一次社会大分工问题的再认识 (275) 旧石器时代肇始于上新世 (275) 我国旧石器文化的特征 (276) 黄河流域不是我国远古文化的唯一发源地 (277) 桑干河流域是东亚、东北亚和西北广大地区石叶系统细石器的发源地 (279) 细石器并不代表一种文化 (280) 中石器时代是否普遍存在 (280) 我国新石器文化的区系类型 (281) 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新探讨 (284) 夏文化的考古学标志 (286) 楚文化的渊源是什么? (288) 殷民族在体质上是单元的蒙古人种 (290) 秦俑坑是具有纪念碑性质的建筑物 (290) 中国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 (291) 我国犁耕农业起源于龙山文化 (292)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早于公元前五千年 (293) 对中国铜器起源时间与特点传统见解的质疑 (293) 我国冶铁始于西周晚期 (294)

史 学 理 论

新时期历史研究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史学工作者就新时期历史研究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提出了不同于“左”倾思想影响下形成的见解的新论点，主要有：

一、历史研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张友渔在《历史研究和四项基本原则》（《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四期）、刘大年在《历史与现实》（同上）中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张友渔指出，在我们的国家里，历史研究是党领导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部分。它是一门党性很强的科学。我们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向一切违背和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进行斗争。他认为，我们说的解放思想，是党历来提倡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完全一致的。“两个凡是”束缚人们的思想，违反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是从“左”的方面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从右的方面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反对这两种倾向，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唯物主义路线。刘大年指出，四项基本原则不是偶然地、轻而易举地提出来的。经过几代人的摸索奋斗，不知多少人流血牺牲，好不容易才得出这几条经验。它准确反映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它关系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关系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炳炳皇皇，载在宪法上，列在党章上，告诉我们必须坚持，不可违反。历史研究如果同十亿人民息息相关的这个根本现实没有什么联系，那么它的存在的价值就值得大大怀疑了。

二、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科学性。黎澍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83年第二期）中认为，用马克思主

义研究中国历史，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任务，也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学的要求。因此，历史学必须遵守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科学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正确地认识现状，并为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依据。就历史学而言，不仅要排除前人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曲解，而且要力求避免今人受现实斗争中的倾向和需要影响而对历史事实的观察加上新的曲解。其次，一般地划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也是必要的。学术是非往往不是可以立即分辨清楚的。它需要时间，通过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和实践的检验，才能判定正确与否。被公认的也并非他人全无异议，相反，只有经得起异议的学术观点才是值得赞许的真理。

三、要开展重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李时岳在《马克思主义的再学习和历史的再认识》（《史学集刊》1982年第二期）中指出，近年来，历史学界“重史轻论”的现象有所抬头。它有意无意地贬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甚至认为理论指导有损于历史学的客观性、科学性。这一现象极不利于历史学的健康发展。为此，需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重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可以重新检验我们对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认识，肃清教条主义和极左政治的流毒，保证历史学的健康发展。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主要的不是恢复到50年代的水平，因为我们已有了新的起点。哪怕是50年代似乎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依据新的情况再提出疑义，也会有新的意义。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再学习、再研究，恢复理论的威信，加深理论素养，丰富思想蕴藏，增强思维能力，从而使我们能够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作出更科学的理论概括和更透彻的历史说明，为历史的再认识开辟广阔的道路。

四、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田昌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世界历

史》1984年第一期)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以其科学性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其科学性就在于它反映了客观的历史内容、本质和内在联系。因此,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不能以欧洲历史为模式,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而必须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从其内部联系和发展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并使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同时补充、丰富以至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

五、通过百家争鸣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苏双碧在《百家争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1982年4月4日《光明日报》)中指出,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应提倡在历史研究中开展百家争鸣。为此要注意几个问题:1.正确地对待百家争鸣中的不同学术观点,提倡争鸣各家互相尊重,共同探索真理。2.不同的学术观点只能说服,不能压服。3.努力学习马列主义,详细地占有材料。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并不排斥历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恰恰相反,作为历史科学研究,由于这门学科是探索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它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才能真正地发现规律和阐明规律。

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新见解

源自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涵义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我国史学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学者提出的主要观点有:以童书业、田昌五为代表的“原始社会说”;日知、王亚南、吴泽等人的“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杨向奎提出的“特殊经济形态说”。70年代末以来,讨论重又展开。在这次讨论中提出的新见解主要有:

一、第六种生产方式说。吴大琨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80年第一期）、《从广义政治经济学看历史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三期）等文中指出，按照马克思的原意，历史上的社会生产方式应该是六种，而不是五种，应该把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方式来研究。这种独立的生产方式的特点是：（1）由作为最高地主的皇帝和各级官吏控制的国家是地主利益的代表者，它依靠农民的“租”和“赋”，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农民是主要生产者，有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但由于工商业者可以把他积累起来的资本投资土地，形成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和地主三位一体的统治，所以无法形成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也无法产生真正的无产阶级；（2）不提倡发展工商业和科学技术，更反对“民主”。据此，他认为，中国自从原始共产社会解体后，夏、商、周三代所建立起来的国家，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式的国家。这种亚细亚式的国家，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动，才由初期的亚细亚式国家发展成为真正中央集权的实行专制主义统治的亚细亚式的国家，即秦、汉王朝以后的中国。

二、封建社会说。庞卓恒、高仲君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几个问题的商榷》（《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三期）中提出，应该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视为不同于西欧型的东方型封建社会。其理由是，古代东方社会主要的生产，是由村社农民进行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原始协作生产和个体生产，主要所有制关系是村社农民的“间接财产”权——村社的世袭占有权——国家最高所有权这样三位一体的所有制体系；在这种所有制体系下，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的经济形式，主要是劳役或产品的“贡赋”形式、“地租与赋税合一”的形式或其他产品地租形式。具有这样的生产关系和剥削形式的社会，不可能是原始社会，也不可能称之为奴隶社会，而应属于封建社会的范

畴。他们还认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封建主义或封建依附关系是有广狭二义的。狭义上的封建主义，仅指农奴制加采邑制的“西欧意义下的封建主义”或“拉丁—日耳曼封建主义”；广义上的封建关系，则泛指与“土地赋役”有关的一切关系。

三、混合阶段说。持此说者的具体观点不尽相同。

1. 原始公有制与奴隶制混合说。项观奇在《论马克思心目中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文史哲》1986年第一期）中指出，按马克思的本意，亚细亚生产方式应是一种具体的、特定的，亦即是“东方社会”的生产方式，它不仅包含着带有原始性的公社，而且包括着不需要更严酷形式对立的普遍奴隶制。这也就是说，它上有作为“实际的所有者”、“公共财产的真正前提”并由“专制君主所体现的统一总体”，下有作为基础而存在的、能够完全独立的、实行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并缴纳各种贡赋或从事各种工程的各种形式的土地公有制公社。项观奇还认为，恩格斯是在有限的范围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在他那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原有涵义，已被大体分解开来了：“亚洲的文化民族的古代历史上的氏族制度”，是亚洲的原始社会时期，东方的家庭奴隶制是亚细亚古代“阶级压迫的主要形式”——虽然并不排除公社，更不排除专制国家。

2. 奴隶制与封建制混合说。苏凤捷在《关于社会形态问题的质疑和探索》（《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三期）中，从反对把私有制的三个不同发展阶段分别独立而与原始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等一级别并列，共同构成本质不同而又各自独立的五种社会形态的观点出发，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分别属于东方一些国家和私有制形态下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在奴隶制阶段，它属于“普遍奴隶制”范畴；在封建制阶段，它一般都不存在欧洲中世纪的农奴制，而是整个封建阶级的集体所有制。

3. 从原始社会末期到资本主义初期混合说。柯昌基在《从亚

细亚生产方式看中国的古代社会》（《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3年第三期）中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应理解为原始共产社会。不过，这乃是它的引申义，不是它的本义。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本来意思是亚洲农村公社生产方式，它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在古代到中世纪的印度、中国及其他国家长期存在过，经历了上起原始社会末期，下迄资本主义初期的历史时期。它包含的内容相当多，主要有三方面：第一，一人形式的土地国有制，第二，农村公社长期存在；第三，“普遍奴隶”的身份。

五种社会形态说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长期以来，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化，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近年来，随着史学界对奴隶社会历史地位问题讨论的深入，启良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历史规律辨异》（1988年3月23日《光明日报》）、李永昌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几个问题》（《史学理论》1988年第三期）、刘佑成的《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重新划分社会形态》（同上）等文，均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不能把五种社会形态理论视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其主要理由是：

一、五种社会形态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启良认为，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不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它不具备历史规律所具有的重复有效性和普遍适用性。从今天世界史研究成果看来，经过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序列的民族几乎没有。西欧看起来似乎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四个形态，但实际上，奴隶制度的充分发展是在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时代，而封建制是日耳曼人的。刘佑成也认为，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没有全面地、正确地揭示人类